



映照与救赎

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

YINGZHAO YU JIUSHU

雷 鸣◎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映照与救赎

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

YINGZHAO YU JIUSHU

雷 鸣◎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卓 墨

责任校对:余 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 / 雷鸣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504-6

I. ①映… II. ①雷…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8948 号

映照与救赎

YINGZHAO YU JIUSHU

——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

雷 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2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504-6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 HB10QWX059)
河北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序 言

谭旭东

雷鸣致力于当代文学研究多年,前些年出版了一本研究生态文学的著作《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隐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也获得了河北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我和雷鸣相知已久,他称我为兄,我叫他弟,大学时代我们就一起追求文学梦,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各自领域里耕耘,也各有收获。雷鸣要出版《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一书,他邀我写个序言。说实在话,在当代小说研究方面,他走在我前面,而且现在也是国内有名的青年评论家和学者了。他的这部新著,选题好,视野广,论述深,写得严谨,论得通透,完全在我的研究能力之上。

《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是一部值得品读,也值得学习的著作,感觉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对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的“边地叙事”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展现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另一个脉络,还原了真实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是建构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关键,因此一部清晰的文学史,能够给读者传递一个合理的当代文学知识谱系,让读者感受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多种合力内在的关联。但现有的当代文学史,虽然著述很多,据说有 600 多种,但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叙述,或多或少总存在一些偏见、误读或忽视,但从实际的文学史

写作来看,要全面解决当代文学的复杂生态,又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展现当代作家的审美创造力。《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里,雷鸣虽然立足于当代小说“边地书写”,却把“边地作家”和“边地叙事”放置于当代文学和当代中国的整体进程中进行理性梳理,因此,给读者开阔的文学的视野,丰富的文学内涵,仿佛激活了一部真实的文学史。

第二,“边地叙事”概念的提出,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为建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当代文学研究大体有这几个路径:一是对作家作品的分类研究,比如说,乡村题材和现实主义,工业题材和现代主义、女性题材和女性主义,等等,然后在依据这些类别,收集一个作家群来进行整体的论述。二是对当代文学分时段进行研究,把“当代”时间范畴下的每一个小阶段的文学归结在一起,然后寻找他们的时代共性,再结合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文学趣味,进行分析论述。三是对地域性群体的研究,如以省、区、市为范围的地域研究,或以东北、西北、西南等较大区域划界的研究,这种研究多拘囿于民族性、地方性和民俗文化等的考察。四是作家个案的研究,如对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但雷鸣的《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既不是传统的地域研究,也不是传统的主题分类研究,而是结合了地域性、内涵性和文化性,考察到了作家作品的多样性特征的基础之上,给予的文学的美学命名。这个意义不仅在于启迪了当代文学研究,对文艺理论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第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也拓展了文学史书写的空间。长期以来,文学史书写,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序列,把文学创作规范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轨迹里,然后再对作品进行一定的主题分类,来进行书写。因此,当代文学史,有点像作家作品

的政治地位的排序。“边地”视角,不是陈思和的“民间立场”,没有故意“去中心”,“去政治”,而是一种包含了研究者探索精神、主体意识,并结合了研究者深刻的审美经验和深沉的思索而得出的看法。雷鸣笔下的“边地”,不只是一个美学立场,还是文化立场,更是思想的立场。可以说,在《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里,看不到当代文学研究者惯常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妥协和对文学社会属性的歧见,更看不到一般小说评论里就事论事的感性印象,它的每一节文字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给予的符合接受美学的价值指认和文化关怀。

第四,这部著作也让我们看到了雷鸣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细致的研究方法。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一度以宏大叙事为主流,当代文学研究也有拉大架子做高头讲章的习性,但雷鸣这部作品,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既有理性的目光,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看得出来,他读了很多作家作品,对文本的理解是深刻独到的。包括被各种当代文学史和一些主流研究者忽视的作家作品,在这部著作里都得以焕发生机和活力,重现当代小说的丰沛景观。我也读过雷鸣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小说评论》《文艺评论》和《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的学术文章,以及在《文艺报》和《中国教育报》《河北日报》等发表的评论,感觉他对作品的认真负责的解读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也是这部著作充满情感张力和审美感染力的原因。

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和评论家,喜欢盯住一些有“话语权”的作家,比如说,他们喜欢把在文坛处于中心地位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固然有价值,但其内在的真诚度也是可疑的,尤其是,可能因为“权力崇拜”而失去了文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美学品质。雷鸣的当代小说研究,是怀着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充满着人文情怀,这是一般学者所难以达到的。无论是之前的生态文学研究,还是这一次的边地叙事研究,雷鸣都秉承严肃的学问态度和批判精神,同时,也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也是我敬重他的原因。一位怀着人文情怀,对当代文学有感情,对文学世界怀着敬意的学者,他的研究一定比较可靠的,他的研究一定会赢得作家和读者的喜爱。

谭旭东(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得主)

2012年最后一日于北京西山之麓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一、“边地”概念及边地空间的厘定	1
二、“边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5
三、当代文学与边地叙事	9
第一章 革命之化：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	13
第一节 边地的象征资本	16
第二节 边地革命化：建构共享的国家历史记忆	23
第三节 边地新貌：民族国家的光明现实与远景	29
第四节 边地“异数”的遮蔽：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导权	34
第二章 明亮的“飞地”：寻觅从废墟中站起来的 “乌托邦”	40
第一节 临界时代的呼唤与重建	43
第二节 拾取边地的人间温情	52
第三节 边地酷烈映衬青春之光	62
第四节 归去来的“复乐园”诉求	70

第三章 化“缘”为“源”：改造国民性的异质补丁	78
第一节 边缘文化的活力	81
第二节 韩少功：湘西巫楚强生力	90
第三节 郑万隆：东北密林雄劲风	98
第四节 红柯：新疆大野血性魂	105
第五节 姜戎：蒙古草原起苍狼	112
第四章 暧昧的纠结：现代性悖论式存在的显影	122
第一节 边地原生传统之陋	125
第二节 权力魔杖下的边地暗角	133
第三节 边民生存之痛的深层省思	140
第四节 原住民文化的悲情挽歌	148
第五章 寻归荒野：生态新启蒙的本土化经验	158
第一节 激活边地的宗教传统	164
第二节 复现边地的远古神话	173
第三节 呈示边地的荒野状态	181
第四节 憧憬边地的理想家园	190
第六章 突围与皈依：失落之后的精神宿地	200
第一节 最后的据点：文化突围的一次尝试	200
第二节 信仰锚地：向彼岸泅渡	207
第三节 爱情方舟：至纯与古典	214
第七章 边地叙事的反思——以新世纪小说“西藏叙事”为例	221
第一节 奇观化依赖：日常生活谱系的遮蔽	221

第二节 诗意化洁癖: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	227
第三节 原生态崇拜:“东方主义”话语的复制	233
第四节 悬疑化模式:与大众文化舞蹁跹	237
第八章 异域与异质:边地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244
第一节 表现向度的延展拓宽	244
第二节 价值取向的嬗变崛起	249
第三节 审美气象的焕然一新	254
第九章 个案分析:王蒙与红柯的“新疆叙事”比较	259
第一节 凡人温情与英雄豪情	259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与诗性传奇	264
第三节 纪实的理性与梦幻的神性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77
附录一:边地叙事的主要代表作家及作品	282
附录二:“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 “边疆叙事”小说	286
后 记	307

导 论

一、“边地”概念及边地空间的厘定

所谓边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边远的地区”,而“边远”又被解释为:“靠近国界的;远离中心的地区”。由此而知,“边地”指靠近国界或远离中心的地区。新版《辞海》将它归为外来语,是一个佛教词汇,佛教里称有佛法的印度之外的地方为边地,谓边地之人不得见闻三宝。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韩非,就用过“边地”一词,如《韩非子·亡徵》:“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汉代以降,边地成为了常用词。《汉书·晁错传》有:“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人则小利,大人则大利。”一句;司马迁说霍去病“平生有武艺及广边地之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东汉的张紘反对“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全后汉文·卷八十六》);三国时曹操感慨“边地多悲风”。不难看出,上述的边地,多指远离彼时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

“边地”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的投射,对不同范围与层次的内外关系认识的总结。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的观念基础就是“服事观”和“华夷观”。所谓“服事”实乃服事天子,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见诸《国语·周语》所记载的“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

服”。它以距离“王畿”中心的远近为序,将天子的制域依次分为甸、侯、宾、要、荒五个不同区域,它反映了不同地区对政治中心(天子)所承担的不同义务。《尚书·禹贡》则详细记载了五服的具体规定。“五服说”反映以一个政治中心为原点,逐步向四周扩散,逐渐由治到不治的过渡,并且由此产生了若干政治层次,其中由治到不治的过渡阶段就是边地。而华夷观或“华夷之辨”则是中国古代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认同形式,华夏民族文化中心论和政权正统(正闰)观念构成华夷之辨的两个基本内容。华夷观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以种族、血缘为基础,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是中心,即中国,而其他住在华夏民族周边则为“五方之民”,他们所住为边地。《礼记·王制》对“五方之民”进行了相当完整的描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①可以看出,边地与中心的出现,主要缘于一国之内,掌控政权的民族天然自我中心主义,凡是掌控政权的民族都认为本民族聚居的地方是居于中心的,其他地域皆位于周边,指认为边地,距政权核心越远,就越边远。因此,在大一统的王朝时期,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399页。

边地就是中央、中原以外的“四方”。《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意思是说，君王位居中央，便于君临天下，安抚四方；而四方朝拜中央的“礼”，就是在这种“定势”中形成的，这里的“四旁”涵盖了本土的四方部落与不是本土的“四夷”的毗邻之地，亦即远离中央政权或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带。还有如古语所说“尊王攘夷”、“内诸夏、外夷狄”或《诗·大雅·民劳》之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也。这“四方”皆为边地。

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边地有不同的内涵与所指，正如上述，我国秦汉以前的所谓西域，以及南夷北狄之类的称谓，已包含有“化外”的意思。当时，许多现在是中国内地发达的地域而言，也被视作是边地了。历史上边地的概念，都是以政权统辖的版图之大小而定，以王朝统治政权中心为原点，凡是远离这个原点的周边地区，则被视作“化外”的蛮夷之地。即汉族的儒家文化教化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远离黄河流域的中原或京畿地区，在这些地区主要为非汉族所居住，不是地理中心所在，也非王朝统治的权力基础及族群利益和价值指向的所在。

对于今天中国“边地”的确认，笔者以为，自然要以我国当下版图所及的边疆地域，同时不能脱离历史发展的轨道与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滞差格局等诸多因素来界定。

根据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边地”，往往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层面，以一国主体民族或种族构成的核心文化区为界定参照的，与该国主体民族或种族存在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或种族文化区。作为边地，表现出三特点：首先，在外在层面上，边地表现为与国家核心文化区明显的文化景观差异。参考伯克利学派的定义，文化景观是地方文化群体利用和改造自然景观的产物。因此，边

地与核心文化区的文化景观差异不仅体现人口、居住、生产等物质文化景观上,还体现在语言、习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艺术等非物质文化差异上。其次,在更深层面上,文化边地还表现在人群对边地文化的认同上,一方面,对边地内部世居之民来说,这种文化认同表现为对本地的“恋地情结”,以及基于同缘文化之上的共同社会心理结构,有时甚至还可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种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另一方面,对边地内部居民来说,这种文化认同还表现为边地文化同属本国文化的认同。因此,边地是文化景观差异与文化认同的统一。最后,边地在空间区位分布上,由于与少数民族或种族聚居区的空间分布相关,它既可能靠近国界,如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可能因为自然和历史因素而镶嵌于文化核心区内部,如我国的湘西苗族自治州等。

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我们知道,我国的核心文化区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中原沿海地区,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与汉族文化有明显差异。基于此,本书所理解的边地,是基于中国这一历史地理范畴来说的,它首先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即一般指国家边界的地域或地区边界线,但更多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因此,本书所指称的“边地”,既是一个实际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空间,是一个由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边疆或内涵上的交叉,但又完全不等于靠近国界的边疆区划,它是不同于汉族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为依据划分的,与此对应的文化参照模式是以东南沿海的现代都市文明,以及处在都市文明与游牧文明板块之间的广阔的中部农耕文明。因此,本书所界定的边地范畴,是指与中原沿海相对的“内陆边疆”,具体而言,则指大西南、

大西北、东北与邻国相毗连的边疆,同时还包括国内地区相交,少数民族杂居的区域如滇川、滇藏、川藏、湘黔等交界地域。

二、“边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已如上述,边地是相对于国家的首都和文化核心区而言,是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区,边地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通常呈现出不同于内地或沿海的独特文化形态。许多学者都指出过此种独特“边地文化”现象的存在。早在1940年代,吴文藻先生指出:“边地人与内地乡下人程度的相差,亦如内地乡下人与城里人程度相差。尤有甚者,以边地人与内地人乡下人来比,举凡民族性格、语言文字、习俗风尚、宗教信仰、文化方式、无一不是大相悬殊。”“边地草野大都以牧畜为业,内地乡下则以农耕为主,尤以人工灌溉的精耕细作见长。牧畜文化与农业文化程度的相差,有如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程度的相差。”^①笔者认为,与中原沿海地带相比,边地文化有以下特殊性:

第一、不同于内地的历史文明形态。学界已有公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我国历史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华夏农耕文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百越稻作文化、南方山地民族的高山文化以及北方和西部民族的游牧文化,共同汇成了恢弘博大、形式迥然的中华文明。而我们今天所指的边地,历史上文明形态不同于中原内地的农耕文明和沿海的商业文明,它们主要是西部的游牧文明、南部高山文化以及东北边界地区的半狩猎文明。在中国东北部的边远地区,向北直抵今西伯利亚广大地域,自远古以迄近代,始终是世界范围内分布最为辽阔、形态最完整的渔猎文化区。

^①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见《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

在北方,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脉,以巨大辽阔的蒙古高原为基地而俯瞰四方,自古是众多“马背”上民族生息繁衍、迁徙游牧的家园,这一地区堪称世界上最典型的游牧文化区。在西北边地,则是发达的草原游牧文化和特有的绿洲农业文化,在西南边地,有独具一格的山地高原农牧混合型文化。不同的文明形态,必然孕育出不同民族文化。如历史上活跃于我国西部边地的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匈奴人、柔然人、鲜卑人、突厥人都属于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以游牧文明为主体,这种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催生出游牧民族独有的日常生活礼俗、婚姻形式、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结构、精神气质。诚如学者孟驰北指出:“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方面。草原民族从物质的丰富和各种符号积累的深厚方面虽然远不如农业社会,但丝毫也不能低估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气质。他们的精神和气质包容着人类远古以来就有的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因为他们在旷野、草原、山坳中,各种自然灾害如大雨、大雪、坚冰、山洪、飓风经常光顾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经常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元素,如冒险、进取、奋斗、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①

第二、现代性的滞后,边地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的前现代特征。我们知道,中国的边地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的多种原因,边地一般相对闭塞、交通不便,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

^① 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2—33页。